蔣介石的另一面

仁 杰

人與事

蔣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原名瑞元，學名志清，是中華民國史上顯要人物。辛亥革命也應有蔣氏的地位（特別是後期），但在內地紀念辛亥百年的文章中提到他的事迹不多。

筆者在擔任一部新編地方志編輯工作期間，在與《寧波市志》、《奉化縣志》同仁交流業務中，就專門談到該兩志對入志人物蔣介石的評價問題。作爲省地方志學會的一員，此後就一直收集有關對蔣氏史實及研究成果資料。今特在此摘編部分內容，配合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蔣氏的簡歷是這樣的：早年曾就學保定軍官學校，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時協助滬軍都督陳其美。一九二四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蔣氏被派赴蘇聯學習軍事。回國後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旋兼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進行北伐。北伐勝利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央政治會議主席，進行反共內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後，開始第二次國共合作。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蔣氏領導全國抗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領導從日本人手中收復台灣，後又進行反共內戰。一九四八年當選中華民國總統。一九四九年敗退台灣。

由於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內地一直稱蔣氏是「人民公敵」（陳伯達寫了專著《人民公敵蔣介石》），還有「賣國賊」等政治帽子一大堆。這當然就不可能正確全面評價蔣氏歷史的功過是非。實際上對蔣氏能否實事求是地進行歷史評價，功是功、過是過，不僅關係到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更關係到國共兩黨、海峽兩岸關係的處理與發展，關係到國家統一。

內地改革開放後，政治思想界到學術界逐步清除以前「左」的一切，人們思想得到大解放。在此背景下對蔣氏的研究逐漸深入，歷史評價也就往全面公正靠攏。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百年紀念來到之際，《中華民國史》（全三十六冊）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該史對蔣氏有較爲全面深入的論述。對他早年投身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過後領導北伐、推倒北洋軍閥，尤其是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都給予應有的肯定評論；對他的反共、導致國共關係破裂，內外政策的保守性及其個人統治的獨裁性，抗戰勝利後發動內戰的責任，等等，也予以充分的擺事實和批評。總體而言，該史對蔣的評價較以往更爲全面、立體、多面和平實。

但史學界對蔣氏歷史功過的研究還在深入中。在此特別一提的是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民國史和國民黨史專家楊天石，他著有《找尋眞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眞相》等書，研究的角度全新。

楊天石主要通過蔣的日記揭示許多眞相。「十月革命」後蔣還學過俄文，讀馬克思著作竟「不忍釋卷」，成爲受共產主義影響「憤青」；但在蘇聯幾個月期間看到斯大林的內鬥，他便對蘇聯政治充滿失望。國民黨內最早提出「聯共」的是蔣介石。北伐後期蔣發動「四一二政變」原因很複雜，其中包括蔣和汪精衛的領導權之爭。抗戰期間蔣一度想「收容」共產黨；內戰時期與共產黨徹底決裂，曾想在重慶扣留毛澤東，後考慮再三，來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對毛頒發了抗日勳章；在台灣時期堅持「一個中國」、民族主義，去世前幾年積極建設台灣……楊天石認爲蔣領導了北伐，領導了抗戰，一生堅持「一個中國」，是值得後人肯定的。

失足女子

流 沙

這是一個帶有憐憫的詞彙。但幾乎所有人都知道，她們所從事的「職業」。有位女警，她的職業生涯也許並不長，她在微博上說了不少關於「失足婦女」的事。A女，初中畢業，最早在東莞鞋廠工作。經小姐妹介紹在廣州「入行」，一年前被介紹到浙江。被警方抓獲時，她手拎LV包、穿價值上萬的名牌衣服、有白色蘋果手機。後在她住處取證，衣櫃內皆爲名牌衣服，使用的是最新款的蘋果筆記本……

B女，中專畢業，入行五年，長得很靚。一直是一家娛樂會所的「頭牌」，有固定客人。但非常奇怪的是，此女有一男友，每天凌晨會到會所大門口來接她回家。抓獲時，發現此女身上青一塊、紫一塊，顯然是遭受過暴力。此女解釋，是男友嫌她這段時間給錢太少，男友打了她。

女警在微博中感嘆，她參與了幾十起「失足婦女」案，發現她們身上有兩個非常明顯的特點，一是大筆花錢爲自己購買奢侈品；二是她們用自己的皮肉錢「供養」男友。女警覺得前者尚有道理，但後者令人不可思議。

女警的微博在網上少有人關注，後來她似乎覺得不妥，內容又全部刪了。

但有一條網友的評論很有意思：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墓志銘。失足婦女也自然難逃複雜的人性。她們的「失足」是故意的，還是遭遇了陷阱，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們的無法自拔，甚至樂在其中，重要的是她們給了自己一個繼續失足的理由和安慰——我享受了人間的奢侈，我爲了自己的愛人而在痛苦付出。特別是後者，幾乎就是她們幹這一行的「精神支柱」，她們有一種爲了「所愛」而「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悲壯和從容。

這個世界上一切生物都會找到自己之所以存在的道理，如果把人分成「好人」和「壞人」，他們做的「好事」還是「壞事」，最初支撐他們的都有一個道理、一個信念。只不過，有的道理實在荒謬、荒唐和自欺欺人；而有的道理如日光華，如玉溫潤。就看你如何去選擇，有人選對了，有人卻選錯了，這就成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稿費苦樂

陳魯民

如是我見

別人寫稿爲什麼我不知道，我寫稿的主要動機就是爲了稿費，清代詩人龔自珍說「著書都爲稻粱謀」，我與他所見略同。當然，拿稿費之外，寫稿也確實能娛樂他人，教化社會，影響世風，這大概就是所謂「主觀爲自己，客觀爲別人」吧。

可最近我寫稿越來越沒勁兒了，重要原因就是覺得內地報刊稿費太低，性價比太不合理，還不如我去打工掙錢多。譬如，我如果出去代課，每小時有八十元到一百元酬勞，而寫一篇千把字的稿子，要花半天時間，所得稿費不過六十元左右。最低一次，曾得到十八元稿費，那是內地一家市級報紙給的，我去郵局取稿費都很不好意思。

不過，人家報社給這個價也是有根據的，現行的《出版文字作品報酬規定》是一九九〇年頒布的，該規定第六條規定，基本稿酬標準是：原創作品每千字三十元至一百元，翻譯作品每千字二十元至八十元，改編、彙編作品千字標準更低。由此看來，人家給我十八元稿費雖然低了點，但也不算太不靠譜。

從一九九〇年到現在，二十年了，什麼都在漲，爭先恐後，你追我趕，就是稿費最沉得住氣，穩如磐石，絲毫不動。有人給魯迅詳細算帳，他一生稿費大約有三百萬元人民幣，十分可觀；林語堂一生稿費有一千二百萬元，更是讓人望塵莫及。所以，魯迅的小日子很滋潤，吃穿不愁，住着小洋樓，生活是小康水平。林語堂更是舒服，生活富庶，還有錢把幾個女兒都送去留學。可他們要是拿我們今天的稿費，估計就沒那麼優哉游哉了。須知，當時魯迅一篇千餘字雜文可得稿費六到十元大洋，他還不算高的，一九三四年《大公報》開設《星期評論》專欄，文章是按篇付酬，每篇稿費四十元大洋。

而在美國，全國發行的刊物的稿費在每字零點七五至二美元之間，地方刊物則爲每字零點一美元左右。也就是說，每千字的稿費在七百五十到二千美元之間。像《紐約時報》，一篇千字文章的稿費是二千多美元。折合成人民幣，每千字的稿費爲四千八百元到一萬二千八百元。而中國國家級報刊的稿費爲每千字一百元人民幣左右。再看歐洲，每千字稿酬大多爲四五百歐元，折算成人民幣爲四五千元。當然，歐美人均收入比我們高很多，稿費高也在情理之中，我們並不奢望稿費向歐美看起，但希望稿費能和物價一起上漲，能和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水平基本持平，應該是不過分的要求。最近因詐騙罪被判無期徒刑的音樂家蘇越，早年創作的《黃土高坡》、《血染的風采》不過拿了六十元稿費，而相關音樂部門賣磁帶和歌盤卻賺了上億元，如果他能根據版權拿到更高的收入，也許會還上欠款而被輕判。一個極有才華的音樂家就要在獄中度過後半生，也確實令人不勝唏噓。

都說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一定有了高稿費就必然能換來高質量的稿件，但時下的低稿費確實把一些有才華的文人趕出了寫作圈。就是仍在堅守的作家，也覺得苦心孤詣、精雕細刻去寫一篇稿子，還不如去炒股、打工合算，那我們的精品佳作就會越來越少，這對建設文化強國大概不是什麼福音。我認識的兩個作家朋友，一個寫小說的最近改炒股了，一個寫雜文的，近來改去推銷保險了。我也在猶豫，是不是以後金盆洗手，把主要精力放在代課上。老實話說，我對寫作還是有興趣的，也有不少編輯是認可我的稿子的，但想想那仨核桃倆棗的稿費，我的心就有些涼了。

懷念葉以群

——從建國後首部文學概論教材說起

黃世瑜

往事鈎沉

以群要是活着，該是百歲老人了。遺憾的是一九六六年當他年富力強的時候就離開了親人、讀者、同仁和朋友。他的生讓人尊敬、讚嘆；他的死讓人遺憾和惋惜；想起以群總讓人思緒紛繁、感慨萬千。

我知道以群始於他翻譯的維諾格拉多夫的《新文學教程》，彼此認識則是在一九六〇年到上海作家協會參加《文學的基本原理》編寫的時候。這之前我們華東師大、復旦、上海師院都各自編寫了文學概論的教材，組織上爲了提高年輕一代的理論水平，提高教材質量，從我們三校抽調了一些師生到鉅鹿路集體編寫文學理論教材。之後，一九六一年中央文科教材會議召開，負責全國文科教材工作的周揚決定《文學概論》編兩本，北京由蔡儀主編一本，上海由以群主編一本。當時提出「主編負責制」，也即一切重大問題如人選、內容質量、寫作程序、出版事宜等均由主編負責。說是主編負責，但以群在工作中很尊重領導，時任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的兪銘璜就多次參加編寫組會議。一九六一年周揚到滬，以群特別安排我們做好準備，參加周揚接見我們編寫組成員的會議，並說「有些問題我可能說服不了你們，你們提出來讓周揚同志給你們講講」。他要我和另一位成員作好記錄，會後認眞討論。之後，編寫組成員作了調整，增加了葉子銘等人。我們聽取周揚意見寫作採用「論從史出」而不搞「以論代史」的寫法，讓事實說話，以理服人；教材要重在講知識，多分析，讓人願意接受；爭論的問題可以把不同意見介紹給學生，不要講得太絕對；要重視中國古代文化傳統，力求把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現代文學實踐和古代文學傳統結合起來；等等。

以群對編寫組的人員十分關心愛護。當時我們這些青年教師大多二十多歲，整天緊張地看書寫稿，討論改稿，有時總也改不好，甚至推倒重來。以群就說放一天假吧，活動活動身心。記得我們到桂林公園去玩了一天，換換腦子，吸吸空氣，回來更好地討論思考問題，想清楚了再寫。

以群學風嚴謹，思考縝密，分析客觀，表達簡潔。他對教材編寫工作費盡心血，一絲不苟，親自擬綱目，定結構。如原來各校的講義往往強調文學與階級的關係，而以群認爲文學與生活的關係是最基本的，一定要先闡述清楚文學與生活的關係。又如他認爲文學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與其他意識形態的區別主要在形象，而與其他藝術門類的區別主要在語言，因此要強調文學的形象、典型，強調文學是語言藝術，文學語言要單獨列章。這種層次分明，着重內在邏輯的分析與章節安排讓人信服，也讓人在接受知識的同時得到理論分析的訓練。再如他認爲題材要多樣化，在題材問題上不能絕對化，要從生活、作家、讀者各個方面分析。對古今中外作家、理論家、文學作品的材料引用認眞思索、仔細考量，如認爲不要總是引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要有一定的面；注意多用中國古代優秀文化遺產的材料；材料要精選，所用的材料要有利於充分說明問題，否則寧可不用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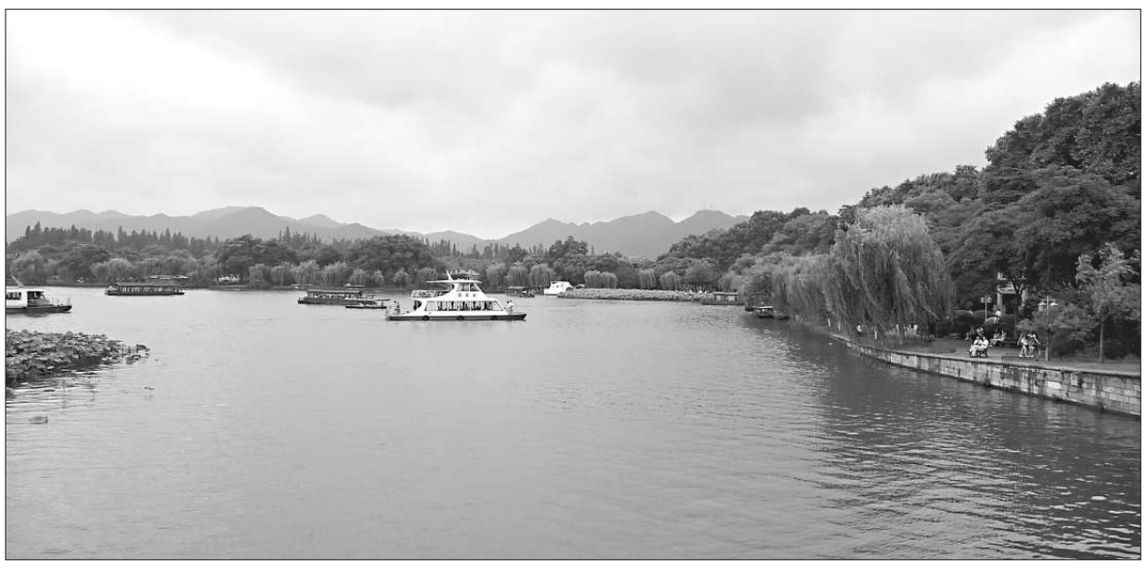
《文學的基本原理》在正式出版之前，曾以「文學概論」名稱分冊鉛印，在復旦、華東師大、上海師院作爲教材試用，並廣泛徵求多位專家的意見，召開各種座談會，對在使用過程中發現的問題進行討論修改。一九六三年《文學的基本原理》上冊出版，一九六四年下冊出版，被全國各高校廣泛採用。可是好景不長，「文革」開始，文藝界成了資產階級文藝黑線專政的領域，理論界成了修正主義氾濫的場所，周揚成了閻王殿的頭子被打倒，以群被迫害致死。各高校停止招生，教師到幹校勞動、下放……

經過十多年的折騰，恢復了高考，教師重新走上講台，但教科書在哪裡？教育部決定修改重版《文學的基本原理》，編寫組成員重新集合起來成立了修訂組。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上午，我們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徵求周揚對教材修訂的意見。這時，以群已經離世十多年，而修訂教材要增加新的內容，有難處。對此周揚曾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你們可以增加一些以群當時也想到的意見嘛！」我想周揚是了解以群的，知道以群對當時文學理論現狀的思考，也知道以群力求突破一些教條框框，但卻因各種原因沒能充分表達，如對文藝批評標準的理解等。現在看來，《文學的基本原理》有着那個年代的烙印和局限，但我們也能從中看到以群在那個年代編寫那樣一本文學理論教材有着多麼難能可貴的理論勇氣和執著追求。

最近，我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以群百年誕辰紀念會，翻閱了葉周編著的《文脈傳承的踐行者》一書，知道了許多以前不知道或不清楚的事，更增強了我對以群的尊重和敬佩之情，也讓我對他的離世倍感惋惜。以群以他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了中國文學文化事業，培養了許多年輕人，也包括當年的我。我一九五六年大學畢業留在母校講授文學理論，一九六〇年到作協在以群的指導下參加《文學的基本原理》的編寫，在時風時雨的文學理論領域工作直到退休，受益於許多專家、學者、前輩，而以群則是我的第一位校外文學理論老師。

跟他編寫《文學的基本原理》的二三年我終身難忘，難忘那幾年爲我以後幾十年理論教學和研究打下的堅實基礎，難忘編寫過程對我的治學方法、理論思維的培養和訓練。以群的一生雖然短暫，但他的精神長留我們心間。



湖光秋色（攝影）普 羅

吳敬梓說風水

耿 法

文化什錦

再如《儒林外史》中余氏兄弟賭咒發誓自己選的葬地風水好狀：余殷吃的差不多，揀了兩根麵條，在桌上彎彎曲曲做了一個來龍，睜着眼道：「我這地要出個狀元。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就把我的兩隻眼睛剜掉了！」主人道：「那地葬下去自然要發？」余敷道：「怎的不發？就要發！並不等三年五年！」余殷道：「偎着就要發！你葬下去才知道好哩。」……

幸好主人余大先生和余二先生都認定余敷、余殷「只說的好聽，究竟是無師之學」，任憑他們說得天花亂墜，就是不信這一套，才沒有上當受騙。

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成書於清代乾隆年間，那時的「風水說」可謂地道的「國粹」了吧，比起如今的時尚風水先生來，那可是眞正老牌的風水祖宗呢。然而吳敬梓一眼看穿了這類「國粹」的把戲，將那夥風水先生的愚蠢而醜惡的嘴臉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絲毫不留情面。

然而正可謂合了一句古話「風水輪流轉」，現今風水又突然吃香了起來，連幾所名牌大學如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的教授也不約而同地鼓吹起「風水說」，且給它披上一襲科學外衣，成爲弘揚「國學」與「國粹」的壯舉。看來，在這些教授、名人的鼓吹下，風水業將要繁榮昌盛，堪輿的春天終於來到了！何況，在這些教授的背後，更有諸多房地產巨鱷的物質財富作支撐，風水已成爲房地產商賺錢的一大要素與時尚。學者與房地產巨賈在「風水說」上悄悄結成了神聖同盟，一向被譽爲「國粹」的風水，在一群教授、學者的參與下，已登上科學的聖殿，呈現出一輪耀眼而神秘的光圈了。更有不少政府官員也對風水產生濃厚興趣，唯恐所在的官衙風水不好，影響自己的仕途官運，於是捨得花大錢（自然是公款）請來風水先生詳加勘察，大興土木，營建確保官運亨通的「風水寶衙」，亦已成爲當代官場一奇景。

然而不管教授、名人、巨賈、官員們怎麼說，筆者覺得還是看看吳敬梓對風水說和風水先生的描繪與刻畫吧。他當然不懂現代科學，但是他具有普通人的生活常識和一般人不具有的豐富的生活閱歷，正是常識和閱歷使他參透人生，見多識廣，不會輕易上當。

歷史告訴我們：缺乏閱歷，往往容易受騙；而違背常識，災難就會接踵而來。因此，在風水這一點上，我相信吳敬梓遠勝於相信名牌大學那幾位風水教授。再說，那幾位教授講的風水算得了什麼「國粹」？吳敬梓揭示的風水才是名副其實原汁原味的原裝原版「國粹」呢！ （下）

夢與醉

叔 山

文化經緯

德國哲學家尼采（F. Nietzsche）醉心音樂，他本人的鋼琴造詣極高，早年曾對華格納的樂劇異常着迷，視華格納爲亦師亦友的長輩。雖然後來跟華格納反目了，甚至在哲學上對其音樂作出嚴厲的批評，但尼采對於音樂的重視，卻是他一生哲學著作中一個不變的立場。

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劇的誕生》是本相當有趣的書。講述古希臘悲劇的起源，在於歌隊的音樂精神。這種音樂精神，其兩個根源可以希臘神話的兩個神象徵。日神阿波羅（Apollo）象徵理智、靜觀、夢幻，代表美的形象，或者音樂精神中精緻優雅的形式追求。酒神狄奧尼修斯（Dionysius）則象徵情感、運動、狂迷，代表醉的情態，或者代表充沛的生命衝動。有賴這兩種精神的合作，希臘悲劇達致了藝術的高峰，尼采認爲，古希臘人亦藉這種藝術而肯定了生命的價值。「只有作爲審美現象存在，世界才可永恆地得到辯護」，尼采如是說。

我們可以借用尼采日神與酒神的理論，以窺見音樂（不一定是悲劇歌隊的音樂，可以是任何的音樂）的意義。的確，優秀的音樂背後都有這兩股力量，一方面是對形式美的追求，阿波羅精神的體現；一方面是生命情意的激發，狄奧尼修斯的體現。前者重理性，後者重情感，而在音樂的表現中兩者是缺一不可，相輔相成。當兩者達到平衡，甚至於水乳交融的境界時，音樂亦達高峰了。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曾說：「酒神用日神的語言說話，而日神最後用酒神的語言說話；這樣悲劇以及所有藝術的最高目的就達到了。」誠非虛語。

在這裡，理性與情感（情意）的區分難免是誤導的、邊界模糊的。在對音樂的感應上，理性必須挾帶情感的指向而成爲「情理」，情感亦應該投入理性的節制而成爲「性情」。在音樂的世界，欠缺理性的情感是盲目的，沒有情感的理性則空虛無物。這情感與理性整體來說就是人類心靈知、情、意整體的感應活動。

情理交融的音樂，將「觀照」與「投入」兩種看似一靜一動、互相對反的心靈活動共冶一爐，是十分奇妙的。不過，強調「夢」與「醉」，難免讓人想入非非，甚至以爲音樂竟讓人掉進「醉生夢死」的麻醉癱瘓之中。當然，這是誤解。音樂精神的夢與醉是帶來生命力的，積極肯定人生的。只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我們是不能排除音樂之可能被誤用，淪爲頹廢沉溺的工具。

過去就是未來

陸 地

人生在線

「窈口」是內地一個小山村，在中國地圖上是找不到點的，也許杭州地圖上會標註上它的名字。從杭州出發，要走高速、再走國道、省道還有鄉道，車子不知在山裡盤旋了多少回，那個「窈口」還在山的深處。

等你到了，才發現這裡別有洞天。

人非常奇怪，我們開上車了，銀行裡有存款了，住上高樓大廈了，以爲什麼都擁有了，卻發現自己擁有不了明媚的陽光、清鮮的空氣、乾淨的水源、悠閒的生活……而「窈口」，這一切都有。這裡的農民，坐享着這世上免費的，也是最珍貴的東西。

描述一個城市或者鄉村，我曾經不能從漂亮文字的掙扎中醒悟過來，總是努力尋找余秋雨式散文的敘事方式，用一種悠長而有文化的視角去解讀，希望用品評一杯紅酒的方式，去評品一杯水，結果就顯得造作或不眞實了。

「窈口」不需描寫，它就是一杯水，而且是免費的。不需門票，也沒有人頭熙攘。青山環抱、涼涼的壺源溪、直視無礙的石斑魚……它不像景區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它實在沒什麼必要。它更像是一個窈窕村姑，身上有古典的詩情和古典的美麗，不過，你要發現它的美，你自己需要詩意。

「窈口」最具特色的東西，發生在夜晚。這裡的農民能歌善舞，剛剛從田裡上來吃罷了晚餐的婦女，也會跳起集體舞。曾經有人問我，他們難道是少數民族嗎？

中國的少數民族非常奇怪，即便生活在偏僻甚至是絕途的地方，他們仍能取悅自己，歌之，舞之，代代相傳，生生不息。「取悅自己」是少數民族的強項，他們對待生活和環境的態度，閃現着人性中最爲積極的光彩。

這個晚上愛運動、愛跳舞、愛唱歌的「窈口」，我也總是認爲是因爲它的地理位置——婉轉百回的通往外界的山路，客觀上製造了一個「與世隔絕」的空間，讓他們像少數民族一樣，在取悅自己中，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現象。還有人說，幾十年前有一支「紅色軍隊」駐紮在這裡，文藝兵們教會了他們彈唱舞蹈。而我更相信，是因爲這裡相對封閉的生活空間，因爲過濾掉了浩浩蕩蕩的「市場經濟」衝擊，得以把「過去」保留了下來，譬如鄉村建築、民風、娛樂方式……

因此「窈口」讓我遭遇了一個「哲學」問題：「過去」就是「現在」。這個「哲學」問題一次次在中國得到了印證：萬里長城、故宮、平遙古城……直至江南水鄉的古建築群，同里、周莊、西塘、烏鎮、龍門……

這些沒有在「城市化」進程中夷爲平地的古建築群，得以成爲旅遊業的載體，而且給生活喧囂城市中的疲憊心靈提供了一方安頓之所。當年我躺在平遙古城一幢年代久遠的四合院的大坑上，聽着高原之風颳過，那一刻感覺既是「現在」，又是「過去」，心靈從來沒有過的安靜。

假如你去一次「窈口」這樣的小山村，呼吸一下這裡的空氣，過幾天靜寂的田園生活，你也許會形成一種判斷，「過去」不僅就是「現在」，而且可以成爲「未來」。

城市已像地殼中噴湧出來的火熱岩漿，吞沒了田園，也吞沒了田園上的生活。但田園是人們心靈的最後棲居。那個音樂天才貝多芬，在失聰之後，用滿腔情懷譜就了一曲「F大調第六交響曲」，它也稱田園交響曲，這是他的精神寄託。也許人只有在大自然的懷抱中，才能得到精神的安寧。

「窈口」這樣的小山村，如若它還能堅持，還有它的自然性。也許，它的「過去」還可以成就未來。